

湯恩伯與上海保衛戰(下)

鄭遠釗

各方評論及其真相

民國三十八年京滬戰役，甚為國人所注視，各方評論亦不一致，茲摘要說明如下：

有人說，京滬失守，而使全局俱非；事實上就軍事言：國軍新銳失于東北，主力覆于徐蚌，且淮河不守，長江下游全面暴露。京滬杭警總收殘破之兵，支艱危之局，其成敗之數不待卜筮。故全面俱非之關鍵，不在京滬而在徐蚌。

就政治言：一個政治中心之失，究在全局關係如何？近事可為例證。抗日戰爭之初，南京即陷敵手。然八年之後，終於勝利還都。又延安共匪老巢，為我犁庭掃穴之後，仍能肆其猖獗，遂以竊踞大陸。是知全局俱非之說，並非允當。

有人說，京滬杭警總統轄十八個軍，擁兵四十餘萬之衆，倘于蕪湖、鎮江、廣德各地，分置有力兵團，則不論匪軍何處渡犯，均可機動迎擊，逐次殲匪于岸邊；事實上京滬杭警備總部所轄部隊，雖號稱十八個軍，但兵員裝備俱全者僅第七五、三七兩軍，其餘損傷輕微者不過兩三個軍，絕大多數不及其編制之半。且輾轉南渡疲敝尤甚，僅憑番號估計，自與實際相去甚遠。

關於兵力部署，京滬杭警總早有計劃，其第一線江防守備與機動兵團的配置，亦與論者所見

略同。惟其實施須待轉進部隊之陸續到達，非如一兩個軍之即時即地即可完成；亦非如正常情況下大兵團之集結開進，可使整然有序一目了然。

如果轉進部隊之到達較早，而原定部署又不為李宗仁所打破，則部署分明，自不致有部隊散置之誤解。又按河川防禦，當正面過大而兵力不足時，通常採用間接配備。其部署與指導要領，在小部隊多以一部為第一線守備，主力為預備隊，乘敵半渡而擊之。在大兵團則於第一線守備外，視情況控制一至數個二線兵團，而期于預設之縱深地帶或預定之有利地區殲擊敵人。自小部隊以至大兵團統兵作戰垂三十年的湯將軍，對此等普遍法則，自當知之甚稔。且如論者所云，既已分置有力兵團機動迎擊，又期逐次殲匪于「岸邊」(按軍語應為「水際」)，是以間接配備之部署而直接配備之指導，毋乃乖違法則自相矛盾。

有人說匪軍雖稱百萬，但橫渡大江，不僅船隻難集，而需時亦必較久，且有我海空阻撓，其行動勢必遲滯，一時亦不能以甚大兵力渡過；筆者以為皖中蘇北湖泊汊港縱橫，舟筏為當地人民最普遍之生活工具，且在共匪暴力之下徵集並非困難。空軍偵察，受夜間濃霧等之限制，時空效力有限。而江防艦隊與江陰要塞之受匪收買，更易掩護匪軍之大量偷渡。所謂長江天堑今則門戶

洞開，若仍持天險難渡、渡亦無多之見，似未免膠柱鼓瑟。

有人說李宗仁以代總統身分行使其統帥權，當其強令警總以主力西移皖南，湯氏如本服從之義則成敗之實在李，然既不受命又未堅拒，致兵力運用上東既不成西亦不就，終于兩敗俱傷，且貽日後李宗仁拒簽福州綏署任命之口實，彼時湯氏去就之分似未為得計；筆者以為湯氏如堅拒李宗仁不使一軍一師西移，在政體上李可對行政院長與參謀總長施加壓力以達其要求。若湯恩伯因此解除兵柄，則失去對此地區反共武裝部隊之控制。且當李宗仁一意向匪求和，正可改任唯命是從之人接掌兵權，則其人之為傳作義第二，京滬為平津之續，殆為勢所必至。故湯氏前此舉發陳儀之大義孤忠，與此時之忍辱負重，皆為非常之事，未可以尋常小節論之。

凡此有關京滬戰役的批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實未易為之折衷使其歸于至當。筆者於此憶及三十八年六月間，于台北檢討京滬作戰時，陳長官辭公之講評云：「當總裁任湯恩伯將軍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時，我正在上海休養，有人對我說：『湯某會把事情弄糟。』此時我說：『國軍屢次重大挫敗，地方浮動騷亂，民心士氣頹喪，在這種危疑震撼的局面裏，恐怕只有湯恩

伯還能挺得住。」果然，他收容殘破軍隊組成江防，並在淞滬地區重創陳毅主力，又把重要的黃金與物資搶運出來。至于上海撤退的問題，我們截亂戰爭成敗，並非在此一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是不錯的。」只此寥寥數語，可以說是京滬戰役最簡要、正確而公允的評判。

湯恩伯將軍受命於危難之際，負責京滬地區的警備重任。由於地區遼闊，可用的兵力僅有十餘萬人；尤以先總統 蔣公引退以後，中央遂失去領導中心，民心士氣至為消沉，經濟財政至為紊亂；又以野心分子的高唱和談，李宗仁對江防部署的干涉，江陰要塞及江防艦隊的叛變，在此種惡劣的情況下，而能對付潛伏市區內數以萬計之匪諜，與抗拒十倍以上用人海戰術攻擊的匪軍二十天之久，湯將軍實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誠然，失地未復，軍人之恥；敗兵之將，何能言勇？尤以國軍高級將領，守土有責，上海之失，湯將軍自難辭其咎；然勝敗乃兵家常事，今無論湯將軍之死守上海有無必要與可能，如僅知死守，而不考慮其他因素，則上海或可多守時日，但台澎金馬恐將不保，尤其台灣自不會有今日安定繁榮的局面。何況上海的撤退，是達成了掩護政府南遷，搶運黃金物資，及消耗匪軍兵力後而奉令撤退的。故上海的撤退，是功是過，目前尚無定論，必須留待將來軍事家及史學家去作客觀的評定。然以上海作戰時湯將軍的勇敢沉著，撤退時的有條不紊，撤退後的忍辱負重，這些優良的品德、能力、智慧與節操，都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搶運黃金物資之功

自由中國的台灣，目前政治修明，軍事強大，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已成爲民主自由的灯塔。自由中國之有今日，固有賴先總統 蔣公，及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英明領導，與中央政府的勵精圖治，及全國軍民與海內外同胞的一致努力，才能達成；然以台灣之安定繁榮，則自台幣之改革始；而台幣之能改革，又有賴中央銀行連台的黃金以爲準備金；而中央銀行的黃金，并非由該行事先有計畫的搬遷，而係戰況緊急時，湯將軍奉蔣公之命的緊急措施。假定當時如無湯將軍與陳大慶的機警處置，與該部警衛營監護官兵的忠貞負責，則這一批黃金不但有被李宗仁送給共匪作爲和談資本的可能，而且台灣的經濟決沒有現在的成長。

五月一日上海外圍即開始戰鬥，十三日揚行、月浦發生激戰，十六日共匪發動四十萬人圍攻上海。此時筆者任職淞滬警備司令部警衛營中校營長，五月十六日晚上十一時許，陳司令（大慶）命本營派兵一連乘卡車六輛，到中央銀行去搬運物品，車子到達中央銀行時，已經是十二點了，此時市區內業已戒嚴，外圍仍有激烈的槍砲聲。到了那裏以後，有中央銀行的職員在等候著，由於他們的指引，將一箱一箱很重的東西搬運到卡車上，每車派武裝士兵一班押運，開至吳淞口海軍碼頭，送到海軍中字第一〇五號登陸艇，那裏有湯總部的少將高參彭寶良將軍，負責指揮，六輛車子往返運送了三次才運完，此時業已天明

，完成了任務以後，這一連的官兵就留在登陸艇上歸彭將軍指揮，擔任護航的任務，當我面報陳司令及湯總司令時，希望將本營第二連留一個排擔任押運任務，其餘調回歸建，擔任警備任務，陳司令告以：「那一條小小的登陸艇，是裝運中央銀行的黃金，其重要性不亞於上海的所有軍用物資；警衛任務固然重要，押運黃金的任務更爲重要。」

這一批黃金的數量，是由中央銀行派員自行負責的，本營的官兵只是負責監護的任務。我們撤退來台以後，登陸艇在基隆碼頭靠岸，然後將裝載黃金的箱子搬上碼頭，點交中央銀行負責人轉送台灣銀行接收，完成了一次艱巨的任務。後來政府改革幣制，就是以這一批黃金作爲準備金，所以台灣有今日的安定與繁榮，中央銀行黃金的能搶運來台，應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生活清苦知交俱知

至於物資的搶運，則是由各單位自行負責的，如果上海的保衛，不能堅守兩個多星期，則各單位的很多物資就無法搶運出來；如果沒有各種物資的運台，則對於台灣的經濟必有重大的影響。來台以後，有人造出謠言，說湯將軍很有錢，可能是受了押運黃金的誤會；如果當時中央銀行沒有派人一同來台，則這一誤會就無法澄清。而湯將軍由旅長、師長、軍長、軍團長、總司令、司令官，而至方面大員，也曾擔任京滬地區的受降工作，尤以上海的撤退，更是遍地都是財物，所以有人懷疑湯將軍有錢，這也是正常的臆測；

但事實上湯將軍不但沒有錢，而住在三峽的生活費，及在東京的醫藥費都成問題。由於湯將軍對於執行任務的認真負責，對於領袖的忠貞不二，對於財物的絲毫不苟，對於清苦的生活毫無怨言，此乃值得我們敬佩之四。

與搶運黃金物資有連帶關係的還有外圍工程的構築，及肅清市區內的匪諜也很重要。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四週又無險可守。湯將軍奉命後，首先就加強外圍防禦工程的構築，企圖在陣地外消滅來犯之敵。此時總統 蔣公已引退，代總統李宗仁不但不主張構築工事，而且高唱和談，并鼓動上海部份閩人要求國軍撤退上海。上海原來就潛伏了不少的匪諜，當和談破裂，共匪全面叛亂以後，匪諜在上海的活動，則更形囂張。大專院校的學生，受了共匪的利用，高唱所謂「反饑餓」、「反迫害」、「爭民主」、「爭自由」；工廠的勞工，受了共匪的蠱惑，採取了罷工及遊行的行動；而部份公車罷工，商店罷市，以及破壞經濟與社會的行動，都是共匪發動的。當上海保衛戰的序幕揭開以後，湯將軍命上海市警察局長毛森，立即採取整肅行動，一夜之間，將潛伏在上海的萬餘匪諜乃一網打盡，才維持了內部的安全。如果不構築工事及肅清匪諜，上海那還能守二十多天？如上海不能守，黃金與物資那能運出？

蔣公遺訓重點所在

先總統 蔣公，於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五日及十一日，對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三期的研究員有一篇訓詞，講題為「革

命教育的基礎」。這一篇訓詞，共分以下六段：

- 第一、革命教育的要領。
- 第二、檢討三十年革命教育失敗的根源。
- 第三、對哲學、科學、兵學體認真通的提示。
- 第四、對哲學問題的商榷。
- 第五、革命哲學的基礎。
- 第六、對革命教育的結論。

這一篇訓詞，在闡述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學說是一貫的。其中最後曾提到湯恩伯將軍，蔣公說：

「現在我對於革命教育，要來做一個結論。以後我們革命教育，無論黨政軍學各部門，都要以哲學為其基礎，我始終認為哲學的修養，關係我們革命幹部的前途和事業是至深且鉅的。這特別是在成敗生死當頭的時候，關係更大。這幾日以來，由於湯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覺革命哲學的重要，本來湯恩伯在我們同志中，是一個極忠誠、極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對他只有想念感慨，而無追論置評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對大家說我的感慨，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對生死成敗這一關，總要看得透，也要勸得破才行。湯同志之死，距離他指揮上海保衛戰的時候，只有五年光景，這五年時間，還不到二千年，照我個人看法，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够在他指揮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地悲壯，對革命歷史將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在彌留時候，回憶前塵，內心的感慨和懊悔，與其抱恨終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難過，

所以值得我們檢討痛惜和警惕的。……」

湯將軍因胃疾於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東京逝世，靈柩運回台灣後在台北市極樂殯儀館舉行公祭時，總統 蔣公會親臨致祭。這一篇訓詞，就是在湯恩伯將軍逝世後不久講的。筆者讀到了這一篇訓詞，覺得是我們革命幹部為學、做人、作事的寶典，也是每一個人成功、立業的指針。這一篇訓詞雖然曾提到了湯恩伯的名字，但是只有想念和感慨，而無追論置評的意思。

後來不滿意湯將軍的人，就引用 蔣公的這篇訓詞來批評他，并斷章取義的說：「蔣公批評湯氏未能為主義，為革命而殉職。」又說：「如果把先總統 蔣公於湯將軍故世後有關的一段訓詞引述出來，以作為我立論的佐證，恐怕大家就更不好意思了。」筆者以為，凡是批評湯將軍的人，如果要引用 蔣公的這篇訓詞作為立論的佐證，對湯將軍而言，決無任何不好的批評；否則，不是未讀完這一篇訓詞，就是別有用心。如果讀者要是不肯相信，請再看一看全篇原文即知。筆者讀了這一篇訓詞，獲得以下的幾點認識：

- 第一、先總統 蔣公講話的時間，就是在湯將軍逝世以後，公祭以前的一段期間，他老人家想到了曾經參加北伐、剿匪、抗戰、戡亂，而且為黨國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的湯同志的病逝日本，所以特別感到想念。
- 第二、先總統 蔣公講話的地點是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話的對象是黨政軍的受訓研究員。蔣公是以湯同志死的時間、地點來勉勵各級幹部重視生死的關頭。

第三、先總統 蔣公講話的內容與目的，是說明革命哲學的重要。任何一個人，如果他有了革命哲學的修養，一定會視死如歸，成仁取義。

第四、先總統 蔣公認為湯同志是一個極忠誠、極勇敢的同鄉，所以他老人家對湯同志只有想念與感慨，而無追論置評的本意。

第五、先總統 蔣公的感慨，是說湯同志身經百戰，未能死在戰場；一生汗馬功勞，未能親嘗最後勝利的果實。在湯同志彌留的時候，諒亦無此同感。由於湯將軍在上海的保衛戰役中，既沒有投降變節，也沒有被俘逃跑，而是達成了任務以後奉令撤退的。我們讀了這一篇詞訓以後，再看一看湯將軍追隨 領袖，一生的所作所為，尤其是他「臨危受命」、「拒絕和談」、「大義滅親」、「忍辱負重」、「機警沉着」、「勇敢善戰」的表現，特別值得最高領袖的想念、痛惜與感慨。

當代文獻資料摘要

爲了證明以上所述各節，茲摘錄有關資料如下，以供參考：

一、蔣總統經國先生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爲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爲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政府在播遷來台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那

裏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

又說：「記得 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軍總部，迅速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到了淞、滬棄守，才知道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而成爲現在保衛台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如果不是 父親的高瞻遠矚，湯將軍的部隊恐怕連舟山也無法到達，還會到台灣來嗎？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大的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渡過三十九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問題。」

（摘自「風雨中的寧靜」）

二、據國防部史政局編印之「湯恩伯傳」所載：「將軍統率下游江防部隊轉進淞滬，旬日之間，重振士氣，安定社會，利用既設工事，以十萬殘破之師，而當陳毅匪部優勢十倍之衆，鏖戰兼旬，殲匪逾十三萬，惜因後援枯竭，既無反攻生力，只有保存元氣，迨政府重要物質全部撤退，乃遵照中央指示，由淞滬轉進金廈，建立外島據點，鞏固台灣基地。」（以下均摘自「湯恩伯先生紀念集」）

三、谷正綱先生說：「……三十八年五月的上海保衛戰，我方以十餘萬殘破之師，與十餘倍之匪奮戰兩個多星期，殲匪甚衆。後轉進舟山金廈，鞏固台澎基地。同年十月，有金門大捷，奠定建立台澎反共復國基地的基礎，恩伯兄實有重大的功勞。而他對上海的保

衛戰爭，也盡了最大的努力。……」

四、周至柔將軍說：「他（指湯將軍）那時受命於國家岌岌之際，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我們幾乎每天接觸，研究長江及京滬杭保衛計畫，雖然到後來京滬杭免不了撤守的命運，至於這個保衛戰的功過，後人自有定評，但我所知道的，他已盡了他能够盡的最大努力，這是事實，因爲我每天與他相見，了解特深之故。」

五、黃國書先生說：「上海保衛戰時，湯將軍以各方撤退至京滬之少數部隊，與陳毅匪軍鏖戰兼旬，殲敵十餘萬人，其忠勇堅毅之情，可動天地而泣鬼神，後因孤軍無援，且重要物資均已掩護撤退，乃不得已而撤離上海，隨以兵力及戰鬥資料，建立舟山及金門外圍陣綫，以充實台灣，鞏固復興基地。自由中國能有今日之安定進步，且成爲遠東堅強反共堡壘，將軍之功，實不可滅。」

六、張玉麟先生（前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新聞處長）說：「湯將軍在上海會戰完成任務後，遵命撤守，率部轉進台灣，並以一部佈防舟山羣島，以禦強敵……我們僅就他搶運國庫存滬的大量黃金一事而論，使我政府日後得有充裕之庫存，藉以維持財經，穩定幣值，其功實不可沒。」

七、劉培初將軍說：「談到上海之戰，我認爲以此責湯將軍，未免太苛，那時大勢已去，人心已喪，那個政治家、軍事家能大膽的說一句，在這種形勢下，以七湊八拼之部隊，

尚有挽狂瀾於既倒的把握。這個時代已去，只有重新去創造一個時代，再圖恢復之一途，舟山的撤退，正以此種精神出之。」

八、徐復觀先生說：「……他從開始帶兵起，士兵一律叫他『伙夫頭』；我去看他，遇到他吃飯時，清苦一如寒素。一個人的生活，是最兌現不過的。當湯先生的喪事告一段落，我從他的墓地回台北時，胡宗南先生一定要我到他的寓所去談談。到後，胡先生拿出湯先由在日本治病中所寫給他的幾封信，交給我。其中有一封，已經潦草得不能成字了，這實是湯先生最後的絕筆。內中講的是他無法付出醫藥費，要胡先生在老先生前爲他想一點辦法。但是還有人說『湯恩伯很有錢』，事實上他常常是『打腫臉充胖子』地幫助朋友，而刻苦自己。他悠然自得地，在三峽鎮一家小醫院裏動手術，還說『割得很好。』在湯先生死後不久的一天，陳養浩先生流着淚說：『不管怎樣，湯先生的部下，沒有投降的，也沒有貪污的。』這不僅說明了事實，也說明了湯先生的人格。……」

九、石覺將軍說：「湯先生對主義、領袖、國家，是把他所有的都交付出來了，無論在思想、言論和行動上，都表現出是永守不渝的。湯先生布衣粗食，生活儉樸，大氣磅礴，大公無私，他的部下都樂於爲效命。但他性情剛直，做事積極，獲罪於人的地方自然不少。有些事情湯先生真是受冤透頂，但他却有足夠的耐性，永不向人申辯，祇求無愧無

作，心安理得而已。……」

十、李連成將軍說：「先生是我在軍校受訓時的大隊長，他那忠義磅礴的氣魄，認真負責的精神，無微不至的照顧，循循善誘的教法，都足爲學生的楷模，使我們確實獲益不少。……三十八年五月，本軍參加上海保衛戰，先生經常親臨第一線指示機宜，并督促兵站人員對部隊的後勤支援，源源不絕，部隊始能保持旺盛的士氣，并能於苦戰兼旬，重創共匪之後安全轉移。如非先生從容沉着，佈置週密，忠誠負責，大公無私，決不易達成如此艱鉅的任務。……」

有關上海保衛戰的資料很多，因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舉。以上的記載和評述，均爲極公正平實的言論，而上海戰役的得失如何？自可一目了然。因當時上海已成孤島，內無糧彈，外無援軍，如僅知死守，甚至所有的將領都自殺成仁，而不向大處、遠處看，不但對戰事毫無裨益，且對爾後台、澎、金、馬的防務尤爲不利？何能如此孤注一擲，而不顧後果？

是非功過幾點結論

總之湯將軍對黨國、對領袖的忠誠，及在上海保衛戰中的確已盡到了最大的努力；茲根據上列資料的印證，申述筆者的幾點淺見：

第一、如果湯將軍不能臨危受命，而担任如此的艱鉅任務；或因環境惡劣，辭職不幹而一走了之，則對於當時的局勢將會有更大更壞的影響。

第二、如果上海外圍不構築防禦工事，則上海戰役那能抵抗二十幾天？如果不是湯將軍的機

警沉着、勇敢善戰，又怎能消滅共匪十幾萬人？

第三、如果湯恩伯將軍真是對主義沒有認識，對黨國不忠貞，對領袖不忠誠，而接受和談或跟陳儀一齊失足，那還有上海激烈的保衛戰？

第四、如果上海保衛戰不能堅守二十多天，那能搶運上海的黃金與物資？如果不能將上海的黃金及重要物資搶運來台，則台灣的安定繁榮是否會受到影響？

第五、如果湯恩伯將軍不能忍辱負重，犧牲奮鬥，則上海的民心士氣如何能發揮？如果不遵奉命令將上海的國軍轉進到金門、馬祖、台灣來，那對於保衛金、馬、台、澎是否會受到影響？

湯恩伯將軍對上海的失敗并未諉過，在金門的勝利亦未爭功，此種任勞、任怨、任謗的美德實可爲軍人之楷模。平心而論，即以湯恩伯將軍對黨國、對領袖的忠貞，與生病後付不出醫藥費而言，實足令人景仰。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文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